

尚書皐陶謨篇著成的時代

屈 萬 里

這裏所謂皐陶謨，是指今文本（即伏生所傳之本）的皐陶謨而言；它是從『曰若稽古皐陶』開始，到『帝拜曰：兪，往欽哉』爲止。僞古文本（即常見之尚書注疏本及蔡沈集傳本），把它腰斬了，因而變成了兩篇：從『思曰贊贊襄哉』以上，還叫做皐陶謨；從『帝曰：來禹』以下，另給它一個名子，叫做益稷。這種變亂舊章的把戲，在三百年前，已經被閻百詩揭穿了。

從文辭上看，任何人都可以覺察得到，皐陶謨不但不如西周初年的大誥、康誥、酒誥……等古奧，而且不如東周初年的文侯之命；不但不如文侯之命，亦且不如魯僖公時代的費誓（費誓爲魯僖公時書，從余永梁及楊筠如說。）那麼，單就文辭一點來看，皐陶謨之著成，也不會早到春秋中葉。

而且，皐陶謨中，有『撫于五辰』之語。『五辰』是什麼呢？楊筠如的尚書覈詁說：

古有謂四時爲五時之說。……按史記天官書：歲星主春、熒惑主夏、填星主季夏、太白金主秋、辰星主冬。此五辰當即歲星等五星。夏小正傳：『辰也者，星也。』然則五辰之義，本爲五星；因此五星所主不同，引申而爲五時，此五時之說所由來也。

除了『撫于五辰』之外，還有『以出納五言』的話語。孫星衍的今古文尚書注疏說：『五言者，五聲之言。』即是以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聲，配合信、義、仁、禮、智五常；所以五聲之言，也就是五常之言。這些（五辰和五言），以及五采、五色等，顯然地都是五行說盛行以後的產品。五行說的盛行，不會早到春秋時代；從而可知皐陶謨之著成，也不會早到春秋之世。

那麼，皐陶謨究竟作成在什麼時候呢？據我所知，來討論這一問題的人，似乎很

少；鄭重其事地研究皋陶謨篇著成之時代的，除了李泰棻 今文尙書正偽中的皋陶謨正偽之外，似乎再也沒有第二篇專文。皋陶謨正偽，雖然舉了二十七個證據，以證明皋陶謨之偽；但它所舉的，大部分都是「皋陶謨不會作成於虞舜時代」的證據。它的結論，以爲皋陶謨當作於戰國時期，而且在呂氏春秋之後（照它的說法，應該說皋陶謨著成在戰國末年，或秦統一天下之後。）然而所可惜的，它一口咬定了孟子、呂氏春秋等書中與皋陶謨有關的材料，全是皋陶謨抄襲孟子、呂氏春秋等書；但並沒說出何以不是孟子和呂氏春秋等書抄襲的皋陶謨。

皋陶謨不會是虞舜時代的作品，這已是用不着討論的問題。作於戰國末年的說法，我認爲也非確論。本文的目的，便是給它找出幾個比較可信的證據，來試圖判決這個案子（竊取胡先生的語意）。

皋陶謨之著成當在禹貢之後

皋陶謨中，有好幾處襲用禹貢的句子或承用禹貢的「典故」。『隨山刊木』，是整地襲用禹貢的句子，不用說了；至於承用禹貢的「典故」的，則有以下二事：

（一）九川

皋陶謨說：『予決九川，距四海。』九川，解尙書的人，都說是九州之川。九州之川而謂之九川，單從字面上看，就知道是不可通的。這顯然地就是禹貢『九川滌源』的九川。不過，解釋禹貢「九川」的人，也把它說成了九州之川；他們似乎都沒注意到上文的導水。導水是把天下的水分爲九系，即：弱水、黑水、河、漾、江、沅、淮、渭、洛（維）。九川也者，就是這九個系統之水，這是很顯然的。作禹貢的人，對於「九」特別的有興趣：土地既分爲九州，水也分爲九系，山也分爲九脈（叫做九山），澤也只承認九個，田地釐爲九等，賦稅復定爲九級。九川、九山、九澤……這些「自我作古」的成語，在禹貢裏，都是由於歸納前文而來；都是言之有物的。很顯然地，禹貢便是這些「典故」的老家。那麼，皋陶謨的「九川」，是承襲的禹貢，而不是禹貢承襲皋陶謨，這是不爭的事實。

（二）五服

皋陶謨說：「弼成五服，至于五千。」這兩句話如果不詳細地給它作注腳，真叫

人不知道它那葫蘆裏裝得什麼藥。皋陶謨既然順口而出地用了「五服」、「五千」之說、那必然地，在作皋陶謨的人認為「五服」、「五千」等語，在當時是共知共喻的；也就是說，在皋陶謨沒產生之前，「五服」、「五千」的說法，就先已流行了。這說法的「祖籍」是那裏呢？無疑地，還是出於禹貢。

禹貢既把天下分爲九州，同時又把它分爲五服。如果真的實行過這種制度，那麼，擔任劃土分疆工作的人，真也够爲難的了。這些，我們且不管它。我們只看五服是什麼。禹貢說：

五百里甸服：百里賦納總，二百里納銍，三百里納秸服，四百里粟，五百里米。五百里侯服：百里采，二百里男邦，三百里諸侯。五百里綏服：三百里揆文教，二百里奮武衛。五百里要服：三百里夷，二百里蔡。五百里荒服：三百里蠻，二百里流。

這甸侯綏要荒五個服，便是所謂五服。甸服是環王城之外，每面各五百里；也就是說，東西和南北兩兩合計，各共爲一千里。侯服是環甸服之外，每面各五百里。綏、要、荒三服，依此類推。那麼，五服合計，每面共爲二千五百里；也就是東西和南北總計，都是五千里。所以，「五服」彌成，就「至于五千」了。

單就『隨山刊木』一句話來說，我們固然不能確然地斷定是誰抄襲誰；可是，再從「九川」和「五服」兩個證據看來，則皋陶謨之襲禹貢，是絕無疑義的。自然，皋陶謨之著成，必當在禹貢之後。

皋陶謨之著成當在堯典之後

皋陶謨承襲堯典的地方更多。它抄襲堯典的文句，它櫟括堯典的理論，它暗用堯典的故事。在行文方面來說，它的丰神，和堯典宛然相似。在習用的字和辭方面來看，它和堯典，更是一個鼻孔出氣。茲分說如下：

（一）抄襲堯典文句

在堯典裏，帝堯使四岳推薦治水的人時，說：

湯湯洪水方割，蕩蕩懷山襄陵，浩浩滔天。

在皋陶謨裏，禹自述他的功績時說：

洪水滔天，浩浩懷山襄陵。

像『懷山襄陵』和『滔天』這些新穎而漂亮的字眼，照理說，應該很難有「不謀而同」的可能。因而，它們的雷同，必然是由於因襲的關係。

其次，在堯典（偽古文本的舜典）裏，述舜代理天子時的政績說：

五載一巡守，羣后四朝，敷奏以言，明試以功，車服以庸。

而在皋陶謨裏，禹向帝進言，則說：

光天之下，至于海隅蒼生，萬邦黎獻，共惟帝臣。惟帝時舉，敷納以言，明庶以功，車服以庸。

『敷奏以言』以下三句十二字，堯典和皋陶謨幾乎完全相同；只有奏和納、試和庶兩字之異。這情形，也必然是出於因襲，而決不會是偶同。

單就這兩個抄襲的例子而言，我們誠然難以斷定究竟是皋陶謨襲堯典、抑是堯典襲皋陶謨。但由於下述〔（二）、（三）兩段〕的例子可以斷定是皋陶謨襲堯典，從而可知這兩個例子，也必然是皋陶謨抄襲堯典。那麼，其他雷同的句子，如：『曰若稽古』、『直而溫』、『寬而栗』之類（『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』十二字，由於錯簡，此不論。），其爲皋陶謨之襲堯典，也就不問可知道了。

（二） 隱括堯典的理論

皋陶謨在開首一段裏，有這樣幾句話：

都！慎厥身修，思永，惇敍九族，庶明勵翼，邇可遠，在茲。

『慎厥身修』是修身，『惇敍九族』是齊家。明，讀爲萌。萌和眈古時相通。庶眈卽是衆民（本俞樾羣經平議說）。勵，是奮勉的意思。翼，是輔佐的意思。那麼，『庶明勵翼』這句話言外的意思，就是『國治而天下平』了。

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這一套理論的來龍去脈，在這裏我們姑且不談。但我們由於皋陶謨這些話語，卻很容易地就會想到堯典首段的幾句話。堯典說：

克明俊德，以親九族；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；百姓昭明，協和萬邦。黎民於變時雍。

我們誠然可以說：修、齊、治、平這一套儒家的道理，堯典可以用它，皋陶謨也可以用它；因而皋陶謨的話，未必就是襲自堯典。但，我們要知道，真正用修身、齊家、

治國、平天下這些字樣，而又加上格物、致知、正心、誠意等物事，使這套理論整齊化的，是大學一書。而大學却引用了堯典的『克明峻德』一句話，這證明了堯典之著成在大學之前。皋陶謨沒用修身、齊家……等字樣，而且也沒有正心、誠意……等意味，可知它不會晚於大學。加以皋陶謨和堯典兩篇中的文句和習用語雷用的很多，知道它們倆必有密切的關係。然後再看談修、齊、治、平這一套道理而用到『九族』之字樣的，在孟子以前（皋陶謨著成於孟子之前，詳後。），似乎只有堯典和皋陶謨。如此說來，可知堯典和皋陶謨談修、齊、治、平的話，必有一個是竊取者。照文理說，則顯然是皋陶謨隱括堯典，而不會是堯典演繹皋陶謨。所以我認為皋陶謨『慎厥身修……』這些話，是隱括堯典。

（三） 暗用堯典的故事

在堯典裏，當帝堯打算找人來治理他的事的時候，驩兜便推薦了共工。帝堯很不贊成，說：『吁！靜言庸違，象恭滔天。』這固然是不放心共工；而驩兜和共工朋比爲奸，也就可想而知。

到了大舜代堯攝位的時候，對於驩兜這夥人就不客氣了。於是『流共工于幽洲，放驩兜于崇山，竄三苗于三危，殛鯀于羽山。』把這四凶，分別放逐到北、南、西、東四個極遠的角落裏。

驩兜使堯舜不放心的事，在較早的傳說中，似乎只有堯典所說推薦共工的這一案。由於「憂慮」他作奸犯科，於是就和共工同被放逐。竄三苗的竄字，是迫使他們遷徙的意思。堯典裏這兩個故事，就被皋陶謨給用上了。皋陶謨說：

禹曰：『吁！咸若時，惟帝其難之。……能哲而惠，何憂乎驩兜？何遷乎有苗？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？』

我們固然不能斷定這『巧言令色』四字，是襲自論語；但憂驩兜、遷有苗這兩個故事是根據的堯典，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吧？

（四） 習用的字及辭和堯典一致

除了上述的三項之外，在習用的字和辭方面，皋陶謨和堯典，也顯然有因襲的關係。試看下面的例子：

第一，兪字作應對詞用。

兪字作應對詞用，在別的书裏是很少見的；而在堯典和皋陶謨裏，則數見不鮮。其見於堯典中的，如：

帝曰：『兪，予聞；如何？』

帝曰：『兪，咨禹！汝平水土，惟時懋哉。』

帝曰：『兪，咨垂！汝共工。』

帝曰：『兪，往哉汝諧。』（兩見）

帝曰：『兪，咨益！汝作朕虞。』

帝曰：『兪，咨伯！汝作秩宗。……』

帝曰：『兪，往欽哉！』

兪字這樣用法，在別的书裏，真是使人踏破鐵鞋無覓處（堯典以後的书而襲用堯典之用法，不算。）；而在短短的一篇堯典中，竟出現了八次之多。這可以說明，它不但是某時某地所流行的一種稀有的方言；而且，作堯典的人，對它還具有偏好。恰巧作皋陶謨的人，也正有這樣無獨有偶的習慣。試看皋陶謨：

禹曰：『兪，如何？』

禹拜昌言曰：『兪。』

禹曰：『兪，乃言底可績。』

皋陶曰：『兪，師汝昌言。』

帝曰：『兪。』

禹曰：『兪。』

禹曰：『兪哉帝！』

帝拜曰：『兪，往欽哉！』

不多不少，皋陶謨中也出現了八次。作堯典的人和作皋陶謨的人，同有「嗜痂之癖」，這豈不着實地使人奇異嗎？

然而，使人奇異的地方還多着哩！

第二，都字作應對詞用。

都字作應對詞用，在別的书裏，其稀罕的程度，也正和兪字相似。堯典雖然只用過它一次，但因為前無古人，可知始作俑者，就是堯典。堯典的原文是：

驩兜曰：『都！共工方鳩僝功。』

而在皋陶謨裏，就得意揚揚地屢次用它了：

皋陶曰：『都！慎厥身修，思永。……』

皋陶曰：『都！在知人，在安民。』

皋陶曰：『都！亦行有九德。』

禹拜曰：『都，帝！予何言！』

禹曰：『都，帝！慎乃在位。』

這五個例子，關於都字的用法，完全和堯典相同。如果說它們沒有因襲的關係，誰能相信呢？

此外，如帝字用作人王的意義，而不把它當作上帝；在字當作察講，欽哉、亮采、底可績等辭之運用，不但在在都可以證明堯典和皋陶謨有因襲的關係，甚至很類似出於一手。至於文章的丰神，雖然難於具體地說出來；但熟讀堯典和皋陶謨的人，自可以感覺到它們的氣息是相似的。

由於皋陶謨櫟括堯典的理論、和暗用堯典的故事，我們知道皋陶謨的著成，必當在堯典著成之後。由於句子、習用的字和辭雷同的那麼多，以及行文之丰神相似，我很懷疑它倆是出於一手。

禹貢及堯典著成的時代

由前文所述，知皋陶謨之著成，當在禹貢和堯典兩篇之後。那麼，禹貢和堯典之著成，應當在什麼時候呢？現在就我個人的意見，分說如下：

（一）禹貢著成的時代

來討論禹貢篇著成的時代，我們首當注意的，是梁州的貢品。禹貢說：

厥貢璆、鐵、銀、鏹、帑、磬……

我國究竟從什麼時候才曉得用鐵器，到現在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。一般人認為戰國時代，是鐵的發明時期；而鐵器之通行，則當在漢代。我對於這個說法，不能贊同。因為從孟子許行章『許子以釜甑爨，以鐵耕乎』的話看來，似乎在戰國中葉，鐵器已甚流行。況且管子有鐵官之說。管子一書，雖出於後人的追述，而國語引管子的

話，則有：『惡金以鑄鋤夷斤櫨試諸土壤』之語。似乎在春秋時代，確已有鐵器之應用。再看詩秦風有駟驥之篇。驥，是馬的毛色像鐵。馬的毛色，既然取象於鐵而以驥爲名，可知那時必已有鐵。駟驥之篇，不知確實作成於何時；但總不會在秦襄公以前，也似乎不會在秦繆公以後。從這些證據來看，大約鐵之發現，是在東周以來，而或不至於早到西周。禹貢既說貢鐵、鏤（鐵之剛者），則顯然不是西周時代或其以前之人的口氣。

其次，禹貢談梁州的地理，雖不免有誤（如說黑水入南海）；但禹貢作者，對於巴蜀之地已具有那麼多的知識，這也決不是東周以前的人所能企及的。談到蜀地的，最早的材料，恐怕是尙書的牧誓。（甲骨文中的蜀，不是巴蜀之蜀。）而牧誓一文，從文辭來看，它和大誥、康誥……乃至和顧命康王之誥，相去絕遠，可知它決不是西周時代的產品。它的出生，即使早於甘誓、湯誓，但也決不會早到春秋初葉。如此說來，牧誓雖然提到蜀，但不能就認爲它是西周時代中原和蜀已有來往的文獻。東周以來，最容易和蜀發生關係的國家，自然是秦國。而史記商君列傳趙良讚美百里奚佐秦繆公的功業說：

發教封內，而巴人致貢。

從趙良說這話時那種沾沾自喜的態度來看，可知巴人這時是首次入貢中國。而且，可以推知的，在這以前，中原人對於巴蜀的知識，一定很缺乏。其後，到了厲共公二年，史記秦本紀曾說：『蜀人來賂。』又後，到了惠文君改元九年司馬錯滅蜀之後，自然中原人對於巴蜀的知識要豐富得多了。梁州之域，包括了巴和蜀。作禹貢的人，對於巴蜀的地理知識，已知道得那麼多；則其人的時代，決不會在秦繆公之前。

從上述的兩點（梁州貢鐵鏤，及禹貢作者對於梁州之地理知識。）看來，可知禹貢之著成，不會早到春秋中葉。

現在，我們再看它能夠晚到什麼時候。

在禹貢裏，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現象：它在每一州裏既談到當地的山，而又有專門談導山的一段文章。但奇怪的是它竟沒提到『五岳』這個名詞。乃至對於岱、太華、恒山、衡等後世所謂岳者，在禹貢裏，對於這些山也並沒把它們叫做岳。禹貢裏誠然說到岳（又稱太岳）；但那只是霍山的專名；和用爲通名的五岳之岳，根本不同。尤

其奇怪的是，它談到了六府，而竟沒談到五行。五岳，我以為是五行說之下的產物。禹貢既不談五岳、又不談五行，可知當禹貢著成時，五行之說還沒有盛行。

其次，戰國時的鄒衍，有大九州之說。鄒衍的書雖然失傳了；但，他那大九州之說，在史記的孟荀列傳裏，還留着一個輪廓。從這輪廓看來，我們可以斷言大九州之說，必然出於禹貢之後。

基於上述的理由，我認為禹貢之著成，早則不過春秋晚年，遲則不過戰國初葉。

也許有人說：孟子說『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』，可見孟子並沒讀過禹貢；也就是說，在孟子的時候，禹貢尚沒出世。這話，並不能成為決定性的理由。因為孟子讀書並不細心，魯頌閟宮之篇，明明是頌魯僖公，因為詩中明說『周公之孫，莊公之子』。而孟子兩引『戎狄是膺，荊舒是懲』之句，都以為是頌周公。微子啓是紂的哥哥，王子比干是紂的老叔；孟子却說：『以紂為兄之子、且以為君，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。』從這兩個例子看來，孟子把汝、淮、泗三水之下流弄錯，也不能就決然地說孟子沒讀過禹貢；更不能說那時禹貢還沒出世。

（二）堯典著成的時代

我在尚書釋義（即將出版）裏，曾論到堯典一篇著成的時代。我認為堯典篇之著成，當在孔子之後、孟子之前。我所持的理由是：

- 一、本篇開始即云：『曰若稽古』，明為後人述古事之辭。
- 二、本篇文辭平易，去佶屈聱牙之周誥絕遠。知其著成時代，決不能上至西周；更無論西周以前。
- 三、帝字為人王之稱，在真實可據之古籍中，僅周易及尚書有「帝乙」一例。帝乙之稱，由何而起，今不能詳。而謂古人王或時君為帝，乃春秋晚葉及戰國時之風尚。本篇不但有「帝堯」之稱，且單稱帝字而不名；可知其決非春秋中葉以前之人所為。
- 四、周易彖辭、詩雅頌等，以及甲骨文字與早期金文，皆祖妣對稱，無考妣對稱者。考妣對稱，蓋自東周初期始有之。本篇有『如喪考妣』之語，知其不古。
- 五、陰陽五行之學，荀子謂創自子思；即或不爾，亦決不能早至西周。本篇述四

宅觀日事，已隱然以東西南北四方，配春夏秋冬四時；述舜四時巡守四方事，此義尤顯。可知此篇作者，已受五行說之影響。

由上列諸證觀之，知堯典之著成決，不能早至西周。

六、論語述堯禪位之辭云：『堯曰：「咨，爾舜！天之歷數在爾躬；允執其中。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終。」』今堯典無此語。似當孔子時，今本堯典，尙未出世。

七、本篇述堯之德，曰：『克明俊德，以親九族；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；百姓昭明，協和萬邦。黎民於變時雍。』實本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思想爲說。知此篇之著成，不當在孔子之前。

八、本篇述堯崩後，『百姓如喪考妣。三載，四海遏密八音。』孟子謂此爲三年之喪，是也。然三年之喪，以孔門高弟如宰予者。且不肯行。至孟子時，滕人尙謂『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。』可見三年喪之制，至戰國時尙未通行。卽或殷人有此制，然實不爲周人所尙（說見胡適之先生說儒）。至孔子時，始成爲儒家所提倡之禮。本篇既採用三年喪之禮，知其著成，不當在孔子以前。

由上列諸證觀之，知堯典之著成，當在孔子以後。

九、孟子萬章篇引『流共工于幽州，放驩兜于崇山，竄三苗于三危，殛鯀于羽山，四罪而天下咸服』五句。又同篇引『二十有八載，放勳乃殂落；百姓如喪考妣。三載，四海遏密八音』五句，而明著『堯典曰』。知當孟子時，本篇已傳世。

十、楚辭天問云：『不任汨鴻，師何以尙之？僉曰：「何憂？何不課而行之？」』此四句顯然爲櫟括本篇：『僉曰：「於！鯀哉！」帝曰：「吁！咈哉！方命圯族。」岳曰：「異哉。試可，乃以。」』等語之意爲之。是屈原亦已見今本堯典。

由上列諸證觀之，知戰國中葉時，今本堯典已傳世。

根據上舉的十個證據，大致可以斷定堯典的著成時代，約摸在戰國的初年。可是，除了上舉的例證之外，在文公十八年左傳裏，曾引過『慎徽五典』以下六句；僖公二十

七年左傳，也引過『敷奏以言』以下三句。但左傳裏引述詩書的話，有無漢人孱入的，至今還是未決的問題。而左傳之著成，最早也不能前乎戰國初年。所以即使左傳裏這兩段引尙書的話，真的出於左傳作者之手；那也不至於影響了上述的結論。

皋陶謨篇著成的時代

近人考論先秦書籍（此指真正傳自先秦的而言）之真偽的，常常喜歡用閻百詩考證偽古文尙書的辦法，即凡是本書與他書的句子或意義相同的地方，便以爲是本書襲的他書。以堯典爲例吧，孟子所舉的『二十有八載，放勳乃殂落……』，明明地是引自堯典；而近人却硬說是堯典襲自孟子。我們須知道，考辨有心作偽的書（如偽古文尙書之類），可以用閻百詩的方法；考論無心作偽的書，如果也用那種方法，就不免深文羅織，故入人於罪了。

有心作偽的人，不外下述的幾種動機：一、爲利祿；如張霸的百兩篇尙書是（因爲他的騙局如不被揭穿，輕則可以得獎金，重則可以得博士之位。）。二、爲替自己的言論造根據；如王肅的孔子家語、孔叢子等是。三、爲了自己可以暴享發現古書之名；如梅賾的偽古文尙書是。可是，這些壞的動機，在先秦時代都不會有。像堯典、皋陶謨等類的書，只不過是後人把傳說中的古事筆之於書，而不自覺地塗染上一些作者當時的時代色彩而已。堯典、皋陶謨之類，它們自己並沒有冒充唐虞時的作品；它們開頭就說『曰若稽古』，已明白地告訴大家它們都是後人述古之作。對於如此忠實坦白的「被告」，還要用閻百詩的方法去拷問它，豈不冤枉了它！

李泰棻說皋陶謨著成的時代，當在呂氏春秋之後，便是用得閻百詩的方法。所以他的論證，多半是我認爲不足取的。

照我上述的例證看來，皋陶謨之著成，既在禹貢和堯典之後，而禹貢之著成，不能早到春秋中葉；堯典之著成，則約當戰國初年。那麼，皋陶謨之著成，也就不得前於戰國初年了。

皋陶謨的著成時代，其上至既不能前於戰國初年；再看它的下至，究竟能到什麼時候？

孟子公孫丑篇讚美大禹的盛德，說：『禹聞善言則拜。』禹拜善言，這故事的出

處，漢人趙岐，宋人朱熹，都以為是根據尙書。他們的說法是可信的；因為在孟子以前的典籍中，只有尙書的皋陶謨，談到禹拜昌言的事。皋陶謨說：

皋陶曰：『都！慎厥身修，思永。惇敘九族，庶明勵翼，邇可遠，在茲。』禹拜昌言曰：『兪！』

孟子既用了皋陶謨的典故可知當孟子的時代，皋陶謨就已經傳世了。如此說來，皋陶謨之著成，也應該在戰國初葉，而稍後於堯典。

皋陶謨所敘述的史實，和堯典有連索的關係；皋陶謨的語句，許多是抄自堯典；皋陶謨習用的字和辭，和堯典一鼻孔出氣；皋陶謨的筆調，和堯典如出一手；它們的著成時代，又如此密邇。照這種種跡象看來，我覺得它們可能是一個人的作品：先作了堯典，又作了皋陶謨。

四十五年六月三日，揮汗寫訖。時寓臺北。

本文承陳槃庵、勞貞一、周法高三位先生，多所指正；復承張秉權先生惠閱一過：併此志感。

槃庵先生云：『昭公二十九年左傳云：「冬，晉趙鞅、荀寅，帥師城汝濱，遂賦晉國一鼓鐵，以鑄刑鼎，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。」據此，可知春秋末葉，鐵器已頗通行。』此足以補本文之疏略。槃庵先生復惠示鐵雲藏龜第百五葉，有辭云：『貞，□弗其弋羌蜀。』囑核其說。按：此辭所謂「蜀」字者，原文作形，與甲骨文他蜀字之作者不類，而與（龍）字相近。羅氏釋作龍，近是。藏龜據葉玉森說釋蜀，蓋非是也。

貞一先生以爲揚州之域，大部爲吳地，乃不曰吳州而曰揚州。因疑禹貢之著成，或當在越滅吳之後。蓋揚、越義通，揚卽越也。謹附識之。

六月二十九日，萬里又識。